

当春风吹进那座雪域边城

——一位西藏老兵眼中的40年变迁

■罗美富

1976年的冬天，我扛着几十斤重的行李，从家中徒步50公里赶到成都火车站，奔赴我的下一个目的地：军营。更准确地说，是西藏军区某边防团。

火车慢速前行，车窗外的景色渐渐变得陌生。几个小时后，拉萨站到了。一下火车，一股冰冷的空气迎面袭来，穿着部队配发的大好几个鞋码的布鞋，我的脚冻得发麻。

走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泥巴路，来到路尽头的一个大院。整理完行李，我们吃上了进藏的第一顿饭。我记得很清楚，是辣椒炒猪肉和萝卜炖油渣。那时能吃上这样的饭菜实属不易，想必是对我们这群新兵的厚待。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匆匆登车赶往驻地。在老解放卡车的车厢里颠簸了四五天后，终于到了驻地军营。下车一看，我们怀疑自己来错了地方：山坡上森林郁郁葱葱，山谷间清泉流水潺潺，和我们想象中的西藏完全不同。

这就是察隅，一个完全不像西藏的地方。后来我才知道，察隅被称为“西藏小江南”，我的军旅生活就从这里开始。

我的第二故乡

察隅在哪里？在西藏自治区东南端，在祖国与缅甸、印度交界的密林深壑中。因为位置偏僻，交通不便，信息闭塞，那个年代，当地百姓的日子过得苦巴巴。

这里绵延着数百公里的边境线，我们边防官兵与当地群众一起，共同守护着神圣国土，亲如一家。藏族老阿妈阿妈常会来我们的军营，我特别喜欢她递过来的热腾腾的酥油茶。听战友们的说，前年驻地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住在山下的阿妈一家被雪崩埋住，阿妈的丈夫和四个儿女全部遇难，只有阿妈当晚睡在亲戚家免于遇难。后来，官兵找来木板制成棺木将阿妈离世的亲人安葬，又帮阿妈搭建了房屋，全团官兵还凑钱给阿妈买了生活必需品。阿妈为了感谢官兵的恩情，时常到军营里来走动，帮大家洗衣服做做饭，我们也会边喝她打好的酥油茶，边和她聊聊天。她把我们当亲人，我们也管她叫“阿妈”。

后来，我把阿妈的故事讲给旺堆听。旺堆是一名孤儿，父母病故，两个哥哥自小相继夭折。我看着旺堆独自过着凄苦无依的生活，着实扎心，一有时间就给他讲解书本上的知识，给他讲山外的世界。旺堆成了我在察隅第二个最亲的人，这小子也没让我失望，后来考上了大



上世纪70年代，边防团官兵帮察隅百姓修缮房屋。



察隅县古拉乡日本村今日新貌。

学，毕业后又回到察隅当了一名警察。察隅是我的第二故乡，那里有我的战友和亲人。

没被遗忘的察隅沟

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的浪潮开始激荡全国，连如此偏僻的察隅沟都迎来了春风。这里使用了千年的物物交换方式渐渐消失，商店和纸币开始出现。我记得很清楚，1979年2月18日，单位配发了建连以来的第一台黑白电视机。那时，这绝对算得上是个“高大上”的稀罕物件，电视机一装好，全连近百人每晚都挤在一起盯着那个小小的黑白屏幕。

1979年盛夏的一个午后，我们在地里收土豆，广播里突然传来一个动听的声音，是邓丽君！整个土豆田里顿时一片沸腾，很快大家又陶醉在歌声里，几乎忘了收土豆的任务。邓丽君之前已经红遍大江南北，但她的歌声晚了三五年才传进察隅沟。

随着川藏公路的不断修建，内地的很多新鲜玩意儿也涌进了察隅沟。最受欢迎的还是报纸书籍和收音机。关于报纸，那时连队还闹出一个笑话：有个新兵拉肚子，情急之下把报纸当了手纸用，后来被发现，不仅写了检讨，还被罚抄了5遍报纸上的文章。那个年代，一张报纸可以看上百十来回，等到收存的时候，已经基本没了“纸样”。

这里的时代节奏一直慢了几拍。但这一次，改革的春风没有遗忘这座雪域高原的边城。

那个叫顿珠的信使

1979年12月，我如愿转为志愿兵，月底被安排到竹瓦根镇日东村附近的驻地担任为期半年的驻防任务。那里距县城不足百里，一年中却有8个月因大雪封山。不过，日东村村民很少因交通中断而出现缺粮少药的情况，因为我们有这群驻防官兵和他们共渡难关，尽己所能帮他们排忧解难。

年关将近，我把所有对父母的思念都写进信封，让顿珠帮我带到县城寄出去。顿珠和他的父亲是那个年代“快递员”。顿珠是哨所驻地的村民，他的父亲以前是骡马队的，因为一次事故离世，只给顿珠留下两匹马。顿珠牵着马走上了父亲的路，成了村里物品流通的小商贩。同时，他也是哨所的信使，每次上山都会给战士们带来远方亲友的问候。

入冬以来，山上连降大雪，下山的路被大雪掩埋。按照以往上、下山需要的时间计算，顿珠应该赶回来了，可他的身影迟迟未出现。村长见天气恶劣，料到情况不妙，村民和官兵们决定冒着大雪沿着下山的路寻找。最终，我们在一个野猪洞里，发现顿珠斜靠在石头上，已经没了呼吸。他身旁有一堆未点燃的干柴，上面扔着一盒湿透了的火柴。他的怀里，紧紧抱着那个破旧的邮包，里面装着信件中，有我的家信。

回到哨所，处理完顿珠的后事，我才找时间读完了那封家信。信里说父亲病重，要我尽可能回家看看。得到连队的允许，我匆匆忙忙准备下山。临走时，村

长请来两名骡马队的前辈带我下山，当晚我们就住在那个野猪洞里。这是我最后一次离顿珠那么近。

第一次回家探亲

下山后，我换乘开往林芝的铁皮车，继续着赶往家乡的步伐。尽管川藏线沿途风景秀美，我却无心观赏。家信寄出的时间是1980年1月2日，可整整一个半月后信件才送到我手中，我担心父亲的身体状况在这一段时间里愈加恶化。1700多公里的路程，经过9天的辗转跋涉，我从日东哨所回到了家乡重庆。4年过去了，眼前的家乡让我十分不适应，街上出现了揽客的私人汽车、摩托车，自行车也比我离家时多了许多。从火车站花6毛钱就能坐车到家门口，比起入伍时负重几十斤靠脚力赶火车方便多了。

之后的年月，我从志愿兵成长为一名军官，在归家与离家的路途上，眼看着川藏线沿途从泥巴路变成石头路，从石头路变成柏油路，川藏线也因此成为我军旅生涯一个难忘的印记。而1995年4月开通了成都至昌都的航线后，每一次我回家探亲和妻儿来队，都是单位安排乘坐飞机往返，愈发快捷。

20多年间，回家的路，越来越“近”了。

今日察隅

2000年清明节那天，我去给阿妈和顿珠扫墓，也是向他们道个别，年底我就

要转业回故乡了。他们没来得及过上好日子，阿妈生前没见过轿车，更不知道手机是什么。而顿珠，如果当时他有一辆摩托车，也许就不会离世。

临走时，旺堆给我送来酥油和青稞面。他说：“爸爸！你喜欢喝酥油茶，回去喝完了打电话给我，我再给你寄……”尽管平时已经听惯了他叫我“爸爸”，可此刻这一声“爸爸”，还是融化了我的心。旺堆是个好孩子，一直在很努力地学习、工作、生活，但与其说是我帮助了他，不如说是他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离开察隅的15年里，我无数次想沿着318国道回察隅看看，都因为工作未能成行，只能在和旺堆视频聊天时多了解一些。2015年，察隅英雄坡纪念馆建成开园，将散葬多地的447名革命烈士集中安葬。我受邀参加开园仪式，终于有机会重回察隅。

部队原本安排我从重庆飞到昌都，我因为怀念川藏线沿途的风景，申请自驾前往。儿子带着我开了3天的车，沿着川藏线一路前行，眼前尽是平坦宽阔的柏油路，和当年进藏时坑坑洼洼的泥巴路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进入察隅县地界，一切变得熟悉起来。山的样子没变，河流的样子没变，旺堆的踏实诚恳也没变。但是，一切又不一样了，县城的沿山路已经成了一条绿色景观路，村庄也变得“年轻”亮丽，我记忆里的那个察隅已经找不到了。

开园仪式结束后，我去看望阿妈和顿珠。从县城到日东哨所修通了一条公路，骡马队在宽阔的马路和邮车的轰鸣声中销声匿迹。哨所搭起了大棚温室，官兵吃上了新鲜蔬菜，上级配发的汽油发电机和小型水能发电机能保证全天候供电。官兵还帮日东村修建了日东鱼水小学，支援村民日常用电。

在阿妈和顿珠的墓前，我和他们聊了很多，零零碎碎，有当年的回忆，也有今天的好光景。我想，他们在天之灵也会为我们高兴吧。

又过了1年多，我听旺堆说，曾经大多深藏在山沟河谷中的察隅96个行政村已经全部通了公路。察隅，再也不是旧文人笔下那个贫困落后的“瘴疠之地”了。

青山巍巍，绿水滔滔。当春风吹进这座雪域边城，察隅，离成为真正的西藏“江南”，定会不远了。

(冉鹏飞、周训东整理)

那身军装，永远穿在父亲心上

■李超



“家里都好，你已经是老兵了，要多干活，多替领导分忧。”国庆假期，和老爸通了电话。快挂电话时，我又听到了这一句熟悉的嘱托。

老爸是1983年入伍的一名老兵，曾服役于原第27军，入伍第3年随部队到前线参加了作战任务。我从小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也选择了从军。10月1日，全军恢复播放作战号，军号在军营再次响起。“军号一响，士气高涨”，老爸给我讲过的战斗故事一下子涌上我的脑海。

当时，老爸所在部队奔赴前线，主要在山路穿行，从小在平原长大的老爸第一次见识到山连着山是什么景象。为了隐蔽行踪，部队只能夜间行军，老爸和战友们挤在卡车车厢里，车辆的灯光要全部关闭，只能开一盏防空用的红色小灯。车辆缓慢行驶在蜿蜒的盘山路上，不时还会有碎石从山上滚落，稍不留神就可能连人带车坠入悬崖河谷。

接到上级命令，老爸所在的连队要保障一个重点炮台任务。为了确保通信线路安全，党支部临时组建了一支架设小分队，老爸就在其中。因为要避开敌人的侦察，他们选择穿过悬崖峭壁直插原始森林，这条路虽危险，但易于隐蔽，与阵地距离也短。

森林里腐败的气味在空气中弥漫，陡峭的悬崖只能单人爬行通过。在进入原始森林后不久，小分队误入雷区。好在同行的战友中有老兵，经过处理和重新研究路线，小分队摸索着穿过雷区，终于完成了通信线路架设任务。

在老爸参战的那个年代，因为通信方式单一，所以通信枢纽总是成为敌人攻击的重要目标。一次，老爸所在连队组织沿路同时埋设七条通信线路。因为地处山区土质坚硬，大家你一锹我一镐轮流作业，手上磨出了血泡，可没人喊苦喊累，血泡被磨破后，破碎的皮肤和血水粘在铁锹木柄上，大家仍旧继续作业，拼了命也要修通线路。

那一年，老爸和战友们平均年龄才18岁。54条新通信通道，上千次战地抢修，他们出色完成了各项战斗通信保障任务，全排荣立了集体一等功，他也荣立了个人一等功。

战争结束后，因家中父母年迈需要人照顾，老爸放弃了保送军校的机会，在1988年12月退役，投身到祖国的经济建设中。2017年因企业破产他下了岗，没几天又响应号召投身到公益事业中，继续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老爸珍藏着一套老军装，有时我回家时他还拿出来穿一穿，每一次都显得格外自豪。

蹭过历史的河，老爸是在炮火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军人。当我也穿上军装，在军营里听到军号声时，不禁想起了他的峥嵘青春，想起了和平来之不易。我想，和老爸有同样经历的前辈们，每个人一定都有一套珍藏的军装，一直穿在心上。不论他们在什么岗位，这身军装一定都激励着他们，做一个对社会和国家有用的人。

上图：作者全家福。

检阅台下，走过一支司号员方队

■张善亮

记忆·峥嵘岁月

那些年，在军营吹响军号③

虽然离开部队已多年，听不到如今军营重新响起的军号声，但关于军号的许多往事，还是从记忆深处一下子就浮现在我的眼前。

1969年1月，我入伍来到江西省军区独立师三团。5月底，我从司号员培训班结业，带着心爱的军号，到二营五连任司号员。

刚到连队，连里给我买了一个漂亮的新闹钟。我十分喜欢，还特地请木匠师傅做了一个精致的盒子，把闹钟放在里面，并在盒子外面写上“时间就是军队”六个字，提醒自己一定要准确把握全连的作息。每天早上，连队起床前1小时，小闹钟会把我唤醒，我去营房后面的一座小山上学号，到了起床时间，我再回到连队门口吹起床号。看到全连战友在军号的召唤下以排为单位整齐地奔向操场，我特别开心。连队也几次让我组织全连战友学习号谱，帮助大家学会听懂各种号声。连首长还要求哨兵，听到团部营部的军号声时，要及时告诉司号员辨听。

我这个司号员的到来，让连队生活中多了一种声音，军号也让军营生活变得更加生机勃勃。看我年纪小，几位连首长对我关心备至，连长毛六元特地交代负责采购的土买来白糖和鸡蛋，在我每天早上练号回来后，冲一碗糖水鸡蛋给我补充营养。在一个战士一天伙食费只有4角5分钱的上世纪60年代末，这是非常特殊的待遇了。



我在部队服役6年，当了2年司号员，4年司号班长。最难忘的一次经历，是1969年吹着军号走过了检阅台。那一年，江西省要举行国庆20周年大型庆祝活动，省军区安排驻江西各部队的200多名司号员组成一个方队，参加国庆阅兵。8、9月的南昌，骄阳似火，我们200多人在南昌市一所放了暑假的学校里，顶着烈日，冒着酷暑，坚持每天上午、下午和晚上3场训练。当时部队没有夏装，我们穿着长袖军装，扎着腰带，每场训练下来军装都能拧出水，好多人脸上晒脱了皮，但没有人打退堂鼓。经过1个多月的训练，10月1日上午，我们吹着嘹亮的进行曲，迈着整齐的步伐通过了设在南昌八一广场的检阅台接受检阅，是当时所有受阅方队中最吸引观众的。

1969年底，江西省军区独立师奉命调入福建省厦门市，改为厦门守备区。记得部队刚上厦门岛时，通信条件较差，连队没有装电话，营部和连队

联系多用军号。司号员吹号进行通信联络时，有时也会出现差错。一次，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营长王招荣，习惯性地像战争年代那样，让司号班长毕家斌吹号调四连连长来营部。没想到过了一会，四连连长张德盛带着全连跑步来到营部。营长当场问毕家斌：“让你调四连连长来，你怎么调来了四连连长？”毕家斌坚持自己没有吹错号，四连司号员坚持自己没有听错号。营长也左右为难，还是毕家斌脑筋瓜子转得快：“刚才我吹的号，六连司号员也听到了，把他找来一问就清楚了。”六连司号员刘永才跑步来到营部，回答营长的提问：“报告营长，刚才的号声我听到了，调的是四连连长。”王营长很生气，对四连连长说：“回去好好管管你的司号员，连个号都听不清楚，怎么搞的？”真是难为了四连只有16岁的小司号员，回去后被连长狠狠批评了一通。

上图：作者当年吹军号留影。

从“战士理论家”到知名经济学者，退役军人白卫星致力国防经济研究30余年——

搅动国防经济一池“活水”

■本报记者 马三成

9月15日，首届军民融合金陵论坛在南京举行，6位来自军队院校和地方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汇聚一堂。《经济学家》副主编白卫星在论坛上作了以“中国国防经济学家群体”为主题的报告。

国防经济是白卫星研究多年的课题，他和国防经济的渊源，还要从他31年前参军入伍时开始说起。

白卫星出身于“经济世家”，父亲在省财政厅工作，两位兄长都是经济理论工作者。受家庭环境影响，白卫星从中学时就对经济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次，他从参加完一场经济学术研讨会的兄长那里获悉，我国国防经济学的研究在1984年以前还是空白，整整落后发达国家20余年。至此，白卫星萌发了从事国防经济理论研究的念头，甚至决定为此走进军营。

1986年底，18岁的白卫星从山西省太谷县入伍，来到宁夏军区原守备三团服役。在守卫贺兰山的日日夜夜里，在领导和战友的支持下，他刻苦钻研国防经济理论，在理论研究方面屡有建树，他利用业余时间写出多篇文章，在专业学术期刊发表。1988年3月，白卫星收到全军军事经济研究中心给他寄来的聘书，特聘他为中心的研究干事，并邀请他作为全军唯一一名战士代表，参加4个月后在国防大学召开的军事经济理论讨论会。

潜心从事国防经济理论研究的白卫星，入伍后的4年间结合实践进行探索，撰写学术论文40多万字，《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几个战略问题》等多篇论文在《人民日报》《军事经济研究》等军内外报刊上

发表，成为官兵眼中的“战士理论家”。

1991年，白卫星复员后被驻地宁夏计委计划经济研究所破格安置。脱下军装的白卫星仍对国防经济研究念念不忘，把研究国防经济作为服务国防和军队建设应有的责任担当和学术自觉。他在创办《计划与经济》刊物时，就在刊物中设置了“国防经济”研究栏目，开创了地方学术期刊开设国防经济研究专栏的先河。2010年，他在北京创办《经济学家》杂志，同样为国防经济研究在版面上留出了栏目位置。在他的建议下，全面介绍我国经济学发展成果理论荟萃的《中国经济学发展报告》读本，从2016年版开始，也专门增加了国防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内容。

在致力于国防经济研究的同时，白卫星把所有的业余时间倾注于对“贺兰山精神”的弘扬上。虽然在贺兰山当兵只有短短的4年，但白卫星从没忘记自己是一名贺兰山老兵。“在贺兰山当过兵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传承‘贺兰山精神’是我们每一名贺兰山老兵的使命和心愿。”白卫星认为，要弘扬好“贺兰山精神”，需要创新方式，通过开办微信公众号、搜集史料、挖掘退役老兵事迹等来讲好贺兰山卫士的故事。他还希望筹建一个“贺兰山精神之家”，集贺兰山军事历史文化、老兵回忆录、影像资料、史料等为一体，让“贺兰山精神”传承有场地、弘扬有实物，每一个贺兰山老兵来了都能找到自己的“家”，继续在“艰苦奋斗、自觉奉献”的“贺兰山精神”感召下，不忘初心，永葆军人本色。